

民族文化拾叁

泼水节里的胞波情谊

夏阳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朵花中，傣族是一朵绽放着艳丽色彩的奇葩。千百年来，因为与水的紧密联系和深厚情感，傣族被赋以“水的民族”，水成为了“傣族”的灵魂”。泼水节成为了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傣族文化的绚丽多彩，傣族人的淳朴善良，以及优美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传扬，泼水节亦随之美名远扬，吸引四海之人之为神往。

每年4月13至16日左右，是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

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服从、服务边境疫情防控，泼水节狂欢活动停了。3年之后，再次绽放的泼水之花，为中缅边境久欠期盼。

与瑞丽边境村寨相连或依江相望的缅甸木姐市芒秀区的19个村寨，今年将分别组团参加欢庆活动。芒秀区的十九寨，与瑞丽边民有着百年胞波之谊，被瑞丽人亲切称之为“十九寨”。

除了中方的活动，有缅甸四个方队的大型马鹿舞表演，有双方在瑞丽共同举办的“伉俪杯·2023中缅足球联赛”；还有东南亚风情美食、民族服饰展。中缅泼水节活动丰富多彩，展示了鲜明的边境民族文化特征和国际化色彩。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泼水节起源表述为：“与小乘佛教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反映了人们征服干旱、火灾等自然力的朴素愿望”。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风俗辞典·泼水节》写道：“此节起源于印度，后随小乘佛教传播，经缅甸、泰国和老挝传入我国傣族地区。”

在岁月长河中，泼水节早已成为了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皆以泼水辞旧迎新，喜庆新年，类似于中国春节。在中国，泼水节成为傣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新年节日，傣语称之为“比迈”（新年），泼水节为傣历新年。2006年和2008年，西双版纳和德宏相继申报，经国务院批准，该民俗分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50年6月，中缅两国正式建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世界的眼光，敏锐捕捉到缅甸及其东南亚国家对新中国成长的重要意义。中缅外交史中，除了刘少奇、邓小平先后访问缅甸外，周恩来总理曾9次访问缅甸，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少有的。周总理以宽广的胸怀，为中缅胞波友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适逢缅甸泼水节，周总理身穿缅甸传统服装参加泼水节。万人狂欢泼水，工作人员担心总理的安全和健康，一直婉言相劝。但周总理走下车，同狂欢的缅甸人民一握手，相互泼水，全身湿透。

万人盛大的泼水，水珠漫天飞舞成雾，在阳光折射下，形成了一道道绚丽的彩虹。缅甸民众欢声雷动，被这位亲民、爱民的中国总理所折服，他们操着生硬的汉语说，一浪又一浪地喊着：“中国，周恩来”“周恩来，中国”。周总理向大家频频挥手：“水是吉祥物，浇得越多越吉祥幸福。”周总理尊重外国民众习俗，深深打动了缅甸人民，为两国人民久久传颂。

在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下，缅甸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陆地边界条约的邻邦。

陪同周总理访问和泼水的，还有被称为“元帅诗人”的陈毅副总理。中缅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缅甸人民对泼水爱的情思，感染着、激荡着诗人陈毅，使之情思泉涌。在对缅外交中，陈毅先后写过10首充满情感的访缅诗篇。在《赠缅甸友人》中他赞颂中缅两国胞波友谊：“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首深情动人的歌，至今，依然在缅甸广为传唱，成为中缅友谊的象征。

在中缅建交73年的历史上，中缅高层互访不断。进入新时代，中缅两国就构建起中缅经济走廊，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诠释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精神，续写了千年胞波友谊的崭新篇章。

缅甸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由于千年胞波，两国人民在民心相通方面，有着深厚基础，两国人民共同沐浴着常青树一样绿色友谊带来的成果。

这种民心相通的胞波友谊，可以通过许多可感的事例证实。

中缅边境的傣族村寨，多会选择与相邻的一个或几个缅甸村寨结为友好村寨。这种选择，双方认同，地缘相近，情感相亲。结队后就成为亲戚，较为稳固，会延续数十年或更久远，成为情感的纽带。民间交往和重大活动相互邀请，成为沿袭的惯例，作为两国边民组织活动的必要设置。

每年泼水节，双方会致函或口头相邀互动。与各大喊结队的，是相邻的缅甸弄信村。双方将每年泼水节的第三天，确定为友情交流泼水日，到日大等喊会分出一组或几组赴缅甸泼水，缅甸弄信村也会安排人来大等喊交流。

“胞波”，缅语意为“兄弟”。事实上，中缅胞波情谊，不仅仅是意义上的，其延续着一种血缘亲情。这种亲情，除了两国边民，从起始，到久远的迁徙途中，不断分化而成，也镌刻着历史发展的印痕。

“跑缅甸”，曾为时代热词。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边境的傣族，由于贫困落后，大量或渡江、或翻山越岭，前往缅甸或东南亚地区，求生存谋发展，生儿育女定居境外。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中国边民日子一天天向好，使缅甸边民信服仰慕，许多边民归根回国。而边境上的缅甸姑娘，也能嫁到中国，作为一种向往和幸。

从“跑缅甸”到“嫁到中国”，中缅边境产生了许多血缘联系，体现了时代变迁。

在中国的边境对外开放名录中，始终都有瑞丽的名字，这是瑞丽的地缘决定的。瑞丽地处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前沿，是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地势之要，使瑞丽成为了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缅两国最大，也是最活跃的陆路口岸。中缅两国边民的文化互鉴，民心相通，为瑞丽开发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对外开放开放中，瑞丽立足沿边特区、开放前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探索高质量对外开放新经验。虽然，前行之路艰辛坎坷，但创造了“中国边贸看云南，云南边贸看瑞丽”的辉煌。在中缅边境，致力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从2000年起，瑞丽每年举办“中缅胞波狂欢节”，举办由中缅双方轮值的“中缅边交会”。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中缅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异彩纷呈，内容丰富。但是，其中每一项活动，相互泼水狂欢，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有了水，这些活动才有灵性，散发出湿润的浓浓的情意。水的圣洁，给人们带来吉祥和好运气。参加过泼水节的人都知道，水被泼得越多越湿就越吉祥。

泼水作为一种相融的文化，成为不断筑牢牢胞波友谊的黏合剂。在中缅边境开发开放中，成为一种无形的推动力。

泼水节像传递着巨大引力的磁场，吸引着成千上万中缅人民的眼光，湿润着人们的期待。

泼水狂欢，如同纵情喝酒，纵酒至酣，泼水至欢，许多旧渍一洗而光。许多平日难以了结的旧事，会一泼而解。因为人们深信，水是圣洁的，这种圣洁，使水有着神奇的魔力。

人们期待，在一遍又一遍被浇得透湿中，获得吉祥和幸福。

重现隐喻的魅力

——读严琼丽的诗

孔莲莲



隐喻的创作手法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表现方式，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批评文艺理论界成熟起来的。布鲁克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话来概括现代诗歌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重新使用隐喻。”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真正把隐喻的诗歌技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那非朦胧诗人莫属。北岛、舒婷、顾城、芒克，他们个个都是隐喻高手，能把那满腔的幽怨、愤懑和质疑，化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是触目惊心的意象，让虚构的意象幻化成一幅幅动人的场景甚至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成就深刻而蕴藉的诗。然而隐喻的这种手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朦胧诗创作创作到达顶峰的时候，忽然有人出来反对。这些人中，于坚的声音最大，于坚说要“拒绝隐喻，让诗歌重返日常和民间”。于是，在这伙人的鼓噪下，口语诗蜂拥而起，90年代达到高潮，新世纪亦有“梨花体”这种风靡一时的口语诗体，直到如今，依然有名声很响的口语诗人，比如云南诗人陈衍强或者贾浅浅的一些诗作。

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是口语诗无法很好解决的地方：因为语言过于直白而造成诗意的浅淡寡味。比起早期口语诗人韩东、于坚、伊沙们的原创精神，今天的口语诗歌越来越具有争议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重返意象主义的创作理念，以隐喻的写作手法重建诗歌表意的丰富性和含蓄性，成为当下诗歌发展的方向之一。严琼丽，一个90后的女诗人，在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背景下，将这种80年代流行的写诗方式，在她笔端重新复兴，把一个年轻女性的心曲描绘得如此婉转动人，同时，也把这个时代的人文镜像传达得如此抑地有声。《边疆文学》2022年第12期刊登了严琼丽的9首诗歌，笔者就这9首诗歌进行细读。

《空山》这首诗歌将一个诗人的内心心世界写得山河荡漾，花开花落，那是出于她“意象”营造的能力。一座心灵的空山，本来用来隐喻一个人超然物外的状态，然而，此人非仙人，此人乃凡人，所以，看似空山无声，空山无情，而实际上，空山回声不断，空山雨滴绵绵。这种凡人的矛盾心态，在诗人绵密繁复的隐喻性意象的呈现中被表露出来。

《生活》很显然是写诗人自己的生活，诗歌一开始将自己的生活和80年代著名的朦胧诗人北岛的生活作了一个对比，这显示了严琼丽写作的气魄，更表明了其诗歌与北岛的师承关系。诗人所表达的生活是“颓废而速调的”，如“蛛网上被缚住翅膀和双脚的战士”，这种体悟应该也不算新鲜，新鲜的是这两句话：“从混沌之中进化而来的骨头/在低矮的云雾中，走着走着就去了最坚硬的那块/走着走着，最良善的那块/也掉了”，这两句，意象新鲜，概括力爆棚，写出了生活的无奈，更重要的，这四行诗歌在句式上是灵活多变的，诗人并没有以死板的排比句式完成表达，这一点，显示出诗人对诗歌节奏和情感基调的控制力。

《梦》很显然是写诗人自己的生活，诗歌一开始将自己的生活和80年代著名的朦胧诗人北岛的生活作了一个对比，这显示了严琼丽写作的气魄，更表明了其诗歌与北岛的师承关系。诗人所表达的生活是“颓废而速调的”，如“蛛网上被缚住翅膀和双脚的战士”，这种体悟应该也不算新鲜，新鲜的是这两句话：“从混沌之中进化而来的骨头/在低矮的云雾中，走着走着就去了最坚硬的那块/走着走着，最良善的那块/也掉了”，这两句，意象新鲜，概括力爆棚，写出了生活的无奈，更重要的，这四行诗歌在句式上是灵活多变的，诗人并没有以死板的排比句式完成表达，这一点，显示出诗人对诗歌节奏和情感基调的控制力。

《粉色山茶》和《梦中该离开的地方》可以放在一起对读。“粉色山茶”是一个很私人性的意象，推断应该是隐喻生命中的某个美好的理想，

或者用精神分析学术语说是写个人的“白日梦”。白日梦没有“没有话语权”，被生活所迫，只能在深夜之时开放，梦想不能飞扬的诗人是困顿的：“我与这世间再无一只风筝飞上天空的距离/我成为了我的衙役”，一个被生活摧毁理想的“我”，注定成为一个被自我奴役的存在者。《梦中该离开的地方》也是一首记梦诗，只是这个梦是真实的梦，是作者的潜意识，梦中的景象危险、陈旧而破烂，而这个梦正是诗人真实生活的隐喻，最后，她说：“谁是谁的囚徒/被时间与粮食胁迫，被情感鞭打/物种/早已失去了定义的资格”，这一句和《粉色山茶》的末句形成了互文关系。

《码头》和《安检员》这两首诗虽然使用意象大相径庭，但所表之意却很相似。“码头”是一个起航又回航的交汇点，“安检员”是高铁站送人远航的人，这两个意象都让人联想起漂泊。而漂泊的游子最德国的依靠莫过于父亲和母亲，因此，当诗歌《码头》中出现这句：没有父亲庇护的女儿/是码头边没有根的木头，当《安检员》里出现这句：“她们将与所有陌生的母亲一样/迎接所有陌生孩子的到来”，我们并不奇怪，她传达着诗人对家的渴望。这两首诗异曲同工地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漂泊意识和对亲情的渴望，女性意识鲜明地凸显出来。相比《安检员》，诗歌《码头》的表现力更强，“码头，让许多没有脚的灵魂/有鳍可以游，码头/让许多没有思想的浮萍，有岸可以靠”，这两句诗颇有北岛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味道，堪称名言警句，令人深思。

如果说《码头》和《安检员》是表达起航与靠岸的漂泊感，而《列车》则是表达在漂泊途中那种存在的迷失感，这种存在感来自于对空间的迷失——离故乡越来越远，“云与地之间相隔一列火车”；也来自于对时间的迷失——“今天与昨天、今天与明天之间/相隔无数列加速行驶的车”。

《对酒的向往》和《一支像梅花一样孤独的葡萄酒》这两首诗歌可以放在一起读。这两首诗歌里面藏着一个充满狂欢精神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这也是诗人严琼丽灵魂的另一面。这两首诗歌都从童年温暖有爱的记忆开始，而终结于长大后的孤独与不自由。渴望用酒将自己灌醉，或者在大雪覆盖村庄的时刻爬上屋顶，这都体现出诗人孤独境遇中的反抗精神。

通过以上细读，可以看出严琼丽充满隐喻的诗性思维，让她的诗歌充满了新鲜而迷离的意象，每个意象都是一个破解她灵魂的密码，而当真正地破解了这些密码，我们窥探到的，是一个被生活压迫，被故乡遗忘，被亲人忽略的孤独灵魂，严琼丽的诗是一个“失根”的现代女性的自我拯救，她的诗乃是一滴滴“具有穿透力的水”，敲击在生活的“灰色的石头”上，要实现“水滴石穿”。但愿在严琼丽那里，这诗性之水可以真正实现击穿世俗之石的责任。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imzg@163.com

审视地域性 升华文学性

——关于“昆明作家群”的研讨与对话

本报记者 郑千山

癸卯清明时节，一个来自昆明的“文学象群”北上京城，在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上留下了一次独特的旅行。

4月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市文联主办的“从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北京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邱华栋、王瑜、徐可、顾建平、张利、西渡、陈涛、丛辰辰、李蔚超、周伟她以及缪开和、陆毅敏、李朝德等作家、评论家针对以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为代表的“昆明作家群”创作进行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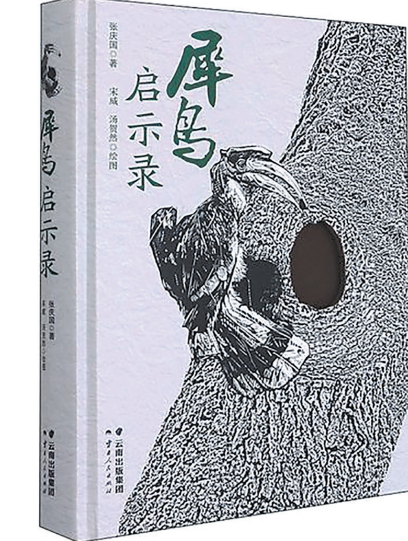
6位作家都是当下“昆明作家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会者认为：小说家张庆国创作逾40年，其创作体量丰厚而庞大，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图谱中一位“贯穿式”的实力派作家；半夏的写作在当代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中独树一帜，她的视角关注山川风物、鱼虫草鸟等一切大地上的生命；陈鹏的小说充满实验性和形式感，其内里充斥着生机和创造性的锐利感；包倬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幽默感和对现实敏锐的捕捉能力，能对一闪而过的瞬间迅速进行美学的审视和文学性的升华；两位诗人胡兴尚和祝立根，诗歌亦各具特色，令人瞩目。

6位昆明作家的创作激发了与会者的研讨激情。张庆国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说自己“年轻时候总是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时他热衷于先锋式写作，不过近几年，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作品更多地选择“落在实处”，去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犀鸟启示录》最近获得了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论家徐可评价其作品写作沉着，用心用情，技巧娴熟，小说《马厩之夜》就是一部指向历史深处和生命本身的作品。在叙述的方式上具有很强的个性与探索性。在作家顾建平看来，张庆国作品富有幽默感和批判精神，其作品中关于城市中、非主流、半边城人物的书写和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叙述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张利对张庆国的小说《黑暗的火车》的情节记忆十分清晰，她对作家建构故事的能力十分认可，对其故事叙述里有明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的明暗缠绕性叙述印象深刻。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中有强烈的地方性，但是这种地方性不是风光化的书写，而是民族性的书写。张利认为，包倬致力于探寻少数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意志性的东西，不回避他的地方性、民族身份，但作品同时有着现代性的内核，探索精神意义上的困境，这是超越了民族的。与包倬相比，陈鹏作品和写作引入了一种世界文学气象，而半夏的作品是走进旷野、荒原，观照虫宇、观照自然、观照万物得来的，这是一种博物学意义的写作。对它有兴趣，去感悟它，把它描述出来，这就是博物志最初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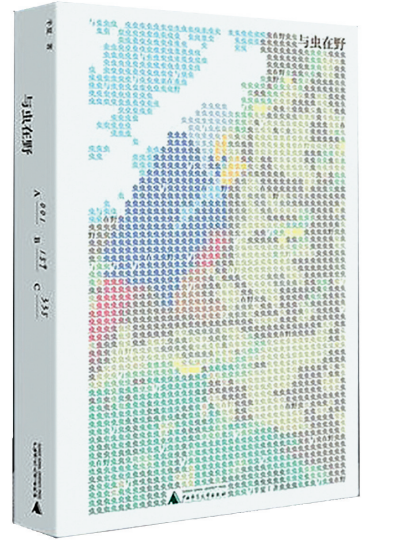
其秉持对动物、植物的关爱之情深入阐述了生物周期的节律，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情。诗人西渡评论认为昆明祝立根、胡兴尚两位诗人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他们都受惠于云南这片土地，有一种共同的地方性，还有一种朴素的直觉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不仅体现在他们如何处理自然题材上，当他们在创作中处理自我，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生命经验时，都体现了一种自然哲学。当然，两位诗人的风格不同，胡兴尚的诗比较克制、内敛、集中，祝立根的诗歌则写得更铺陈。周伟她认为胡兴尚的诗总体倾向于哲理，是由思考而成诗，有一种传统深厚的感觉，与完全世俗化的生活截然不同。而祝立根的诗歌创作倾向于行为和叙述，对于普遍的日常，表现出地方经验的独特性。

4月4日，研讨转换为对话。由十月文学院、昆明市文联主办，昆明作家协会承办的“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在十月文学院举行。宁肯、赵兰振、赵大河、杨碧薇、陆源、李潇潇6位北京作家和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就文学的地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性等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面对面的对话。

此次对话交流，重心不在作家是处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昆明和北京两地作家如何加强交流和合作，就文学创作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共同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身处“边地”或者“中心”，而不要有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赵兰振认为，有时作家身处边地，反而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古今中外，例子很多。蒲松龄在并非文化中心的山东淄川县当了30年的私塾教师，却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聊斋志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一生都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小镇，可他的主要作品《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等都是在这个“邮票大小”的小镇“约克纳帕塔法”完成的。所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胡兴尚认为，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地方应该就是文学的中心，比如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等，都可看作文学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地方性写作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所生活的土地、如何避免惯性的或者无效的写作、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地方的独特性，这是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难题。在诗人、鲁



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看来，所有的文学概念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看待历史叙述，处于不同的历史立场，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当我们谈论“边地”或者“中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断地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下，所有东西都在被扁平化和无聊化，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纳入了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生产机制。所以，任何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度理性化，比如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这些都给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80后壮族作家陆源从语言学角度谈到，“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在李朝德看来，“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实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心”，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管如何，我们热爱文学，对文学的内在要求都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的文学外在表达和形式不一样，但它内在的美学标准和美学追求是一样的，是统一的。而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反而会给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北京作家宁肯认为，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事物暴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



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挖掘越深，作品中异质性质特征就越容易显现。祝立根与张庆国都认为，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但要把握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面面的生活。作家半夏希望通过她的创作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人与世界上所有物种都是生命共同体，都休戚与共。作家赵大河谈到：作家以何种眼光看待与自己相关的地域文化很重要，鲁迅离开绍兴重新观察绍兴，沈从文离开湘西重新观察湘西，都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视角。在包倬看来，作家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家骨子里。北京作家李潇潇认为，作家才华重要，而时代也非常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写作更多地需要世界眼光，作家的学者化、百科全书化是一种时代的要求。陈鹏坦言，作为昆明作家，虽身处地理意义上的“边地”，但丝毫不会影响昆明作家写作的雄心，只是不要把地方写作当成简单的风情展示和符号展览，要深挖进去，要走出书局，走向旷野，走进更远的世界。

“昆明作家群”这次跨越3000多公里的一路北上，对云南作家、对昆明作家的创作意义重大。两场研讨与对话，醒目而深刻。昆明市文联主席陆毅敏表示，文学作为重要的精神载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承担着重要任务。作为云南省会，昆明非常重视本土文学发展，昆明之所以提出“崛起新时代昆明文学创作力量，研讨创作实绩，以期用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展现新时代云南和昆明的精神与文化气象。

新书推荐

台静农《亡明讲史》简体中文版出版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台静农先生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亡明讲史》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2年3月版)。

《亡明讲史》讲述了明清易代之际一段天崩地裂的史事。故事始于李自成攻陷北京，百官四散，崇祯皇帝走投无路，自缢景山；终于南京沦陷，福王被俘。在这样一出亡国大戏里，小说以戏谑滑稽的方式，写出崇祯王室最后一刻的混乱肆虐、宗室朝臣的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的尔虞我诈……这部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之作，表露出其作为一位“五四”文人和革命者的忧国心声。这部小说写成后并未发表，手稿藏于书斋80余载，直到本世纪初被发现，现与读者见面的简体中文版系首次出版。

台静农(1903—1990)，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书法家、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曾于北京参与发起五四以来第三个全国性文学团体“明天社”，后同鲁迅组织未名社，倡导新文学。1945年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早年创作



重心在小说、散文、研究评论以及整理编辑旧集，后寄情书法。其一生笃守学术，在文学、书画、经史研究上都取得了卓然成就。

郑千山